

水落石出的西亭记碑

——颜真卿碑刻研究工作坊综述

陈文波

过去启功先生认为，摹勒上石始于元代，但从《西亭记》《臧怀恪碑》《臧怀亮墓志》这些个案来看，摹勒上石的做法唐代就很流行了，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往前推一点，比如说高达4米的《升仙太子碑》，武则天不可能趴在石面上书丹。



颜真卿时任湖州刺史

颜真卿素以其高尚的人格和卓越的书法艺术成就享誉于世，他书丹的碑刻无一不是中国艺术史上不朽的经典。2019年，颜真卿撰写的《修梁吴兴太守柳文畅西亭记》残碑重现世间，引起了学术界和艺术界的高度关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以此碑入藏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为契机，于12月1日在博物馆会议室举办了颜真卿碑刻研究工作坊。来自世界各地的十余位学者共聚一堂，围绕着颜真卿撰文或书丹的碑版，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西亭记碑是如何制成的

在上午场演讲中，浙江大学薛龙春教授、复旦大学郭永秉教授和西安碑林博物馆陈根远研究员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薛龙春教授的演讲题目是《颜真卿〈修梁吴兴太守柳文畅

西亭记〉读记》。作为工作坊主办方、该碑收藏机构的研究人员，薛教授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简要介绍了此碑的基本情况。此碑为石灰岩质，出土时自右而左斜向横断，仅存上半，左侧残高112厘米，右侧残高133厘米，宽约95.5厘米，厚约40厘米，下部仅剩残石一块，高约28厘米，宽约17厘米，厚约40厘米，经过复原，全碑原高不小于270厘米，四面环刻，碑阴、碑阳皆为12行，碑左侧3行，右侧2行，满行24字，如今仍可辨认的共有266字。从碑右侧的落款可知，该碑立于大历十二年(777)四月，当时的乌程县令李清将要离任，在湖州刺史任上的颜真卿作为他的上司，为他立了这块碑。

紧接着，薛教授讨论了该碑的定名问题。《四部丛刊》影明本《颜鲁公文集》也收录了这篇文章，在文集中，题为《梁吴兴太守柳文畅西亭记》。他指出，这个标题和碑文内容不符，会让人产生柳文畅是文章作者的误解。另一方面，经过目验原石及拓本，发现碑的阴阳两面均有篆额，与颜真

卿书于同一年的《殷夫人碑》合辙，由此可以推知，该碑碑额(即文章原标题)应为《修梁吴兴太守柳文畅西亭记》，与正文首行“湖州乌程县令李清修……”吻合。在书法上，薛教授认为《西亭记》完全符合颜真卿晚年书法的特征，同时，颜真卿对古字的兴趣在该碑中也有较明显的体现。他还指出，在艺术史研究中，不应忽视材料、工艺以及环境因素对风格的影响，而此碑正是观察环境改变碑刻书法风格的一个极好的样本。在因陷入淤泥而保存完好的部分里，点画饱满而有锋芒，足以改变清代以来人们对颜楷起收笔含混的刻板印象。

关于此碑的制作过程，薛教授也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书丹还是钩摹上石？据他研究，唐宋时期的碑版书写方式是书丹和墨本并存，用于刻碑的绢写本称为“书碑样”或“碑样”，颜真卿在《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额表》中说，他准备采石立碑，“遂写绢一本”，即是一例。小型墓志直接书丹的情况较多，但对于丰碑大碣来说，无论将碑竖起还是平

放，直接书丹都不具操作性。如果《西亭记》是钩摹上石的话，恰好还可以解释为何行距不均——两幅绢在上石过朱时，左幅略有挪移。

就薛龙春教授的演讲内容，华人德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书碑样”的载体有没有可能是纸？因为从操作简便程度来看，纸似乎比绢更适合；第二是当时丰碑大碣是先立后刻还是先刻后立？《史记》记载秦始皇巡游天下所立的几处刻石都是先立后刻，所以唐碑先立后刻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对此问题，陈根远研究员推测，立碑的过程应该是先把碑石做好，运送到要立碑的地方平放着，刻好以后就地立碑。薛龙春教授回应说，明代有先刻后立的例子，可参看蔡春旭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其中提到，曾有一个亳州人委托文徵明为他写碑，他从亳州购置碑石，运到苏州，待文徵明写好、刻完以后再运回去，虽然说唐代和明代远隔数百年，情况可能不完全一样，但起码运输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郭永秉教授以《“夜鱼春跃”与“间缉之心”——〈梁吴兴太守柳文畅西亭记〉读后》为题发表演讲。他通过将浙大藏《西亭记》残碑与《四部丛刊》本《颜鲁公文集》中的《梁吴兴太守柳文畅西亭记》一文对勘，校正了后者的两处文字错误。其一，今本“则水堂之功乃余力也夫”一句中的“力”字，碑文作“刃”，郭教授指出，此处与上文“弦歌二岁”“用刀之术”等语相呼应，用《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典。其二，今本“间缉之心”的“间”，碑文作“问”，结合文意推知“间缉”是“问绢”之误字，“问绢”典出《三国志·魏书》卷二七《胡质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此外，他还指出，今本所谓“夜鱼春跃”当为“夜鱼、春翟”之讹，“夜鱼”典出《吕氏春秋·具备》，“春翟”典出《后汉书·鲁恭传》。在此基础上，郭教授还发现，中晚唐时期的一些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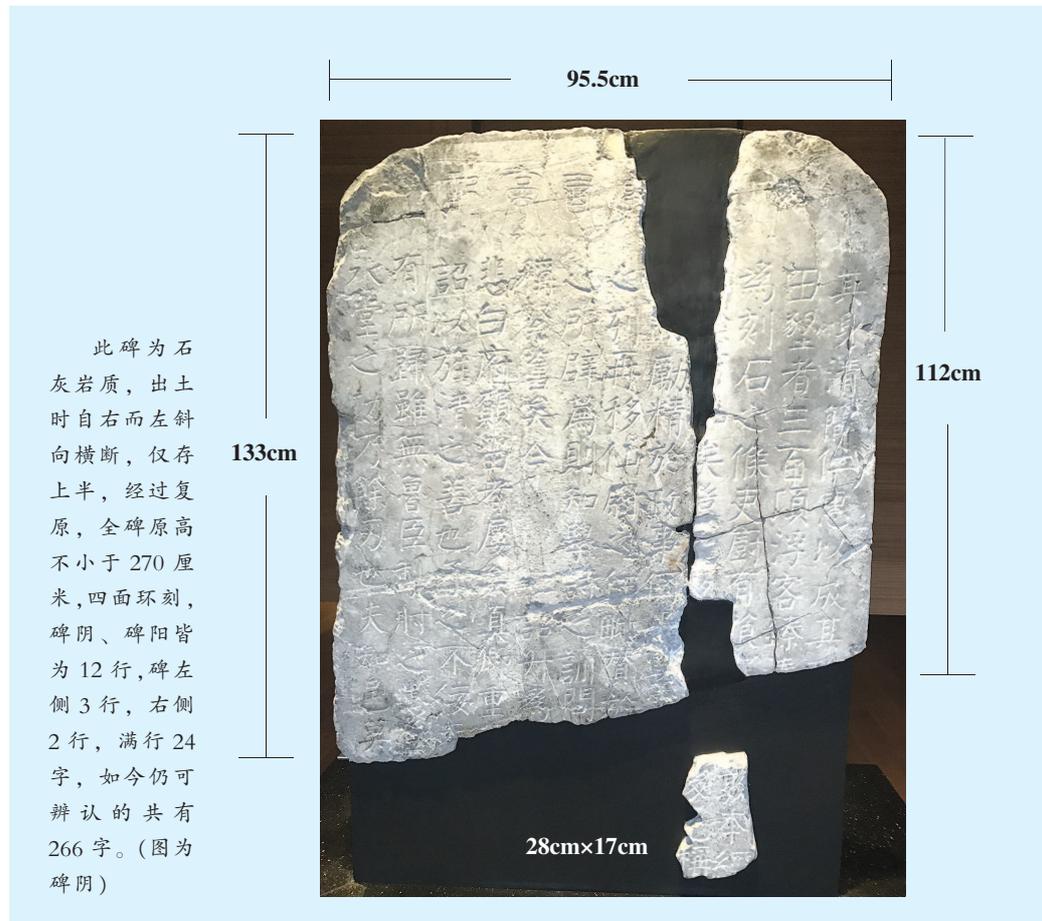
文本中所见的典故组合方式与《西亭记》非常相似，而这样的组合在《西亭记》之前从未出现，他由此推测，《西亭记》的文本在中晚唐流布甚广，影响甚巨。

白谦慎教授指出，郭教授的这项研究是支持《西亭记》残碑为真的关键证据。不过，关于如何解释颜真卿和中晚唐其他作家用典相似现象，他提出了一个疑问：用典的相似性是否一定要归因于因袭或者影响？巧合的可能性大不大？在艺术史领域中，研究者往往会因为几件作品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就轻率地论定创作时代晚的受到时代早的影响，毫不考虑运输、传播的可能性，在文献学领域里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华人德教授谈到，诸如《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在唐代很流行，里面有很多典故，供当时人写文章时参考。史睿研究员补充说，颜真卿刺湖期间完成了360卷的《韵海镜源》，这部书兼具韵书和类书的功能，广收经史子集中两字以上的成词和典故，末字编韵，最后列出典故的出处，目的也是为写诗、做科举文章提供参考。所以说，颜真卿以及中晚唐其他作家用典相似的另一种可能是他们有共同的来源。郭教授对上述意见深表赞同，他说，这也是研究早期历史文献的学者一直反思的问题。

史睿和冯培红两位教授都注意到了《西亭记》残碑正文第五、六行碑文不满行的现象，并对内容进行了推测。史教授认为第五行缺的可能是两个人名，冯教授则认为人名置于此处文意不通。冯教授进一步指出，第七行前四字从残留的笔画来看也不像传世本对应之处的“溪为之昔”四字，可能和传世本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位演讲者是陈根远研究员，题目是《颜真卿研究三题》，由《臧怀恪碑》的刻立时间、颜真卿的碑刻是否直接书丹于石、颜真卿和韩择木的交友三部分组成。《臧怀恪碑》的刻立时间旧有四说，



此碑为石灰岩质，出土时自右而左斜向横断，仅存上半，经过复原，全碑原高不小于270厘米，四面环刻，碑阴、碑阳皆为12行，碑左侧3行，右侧2行，满行24字，如今仍可辨认的共有266字。(图为碑阴)